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英〕雷蒙·道森 (Raymond Dawson) 著

常绍民 明毅 译

中国变色龙

——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书局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D609.9

5

2006

〔英〕雷蒙·道森

(Raymond Dawson) 著

常绍民 明毅 译

中国变色龙

——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英)雷蒙·道森著;常绍民,明毅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西方的中国形象/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ISBN 7-101-05211-8

I. 中… II. ①道…②常…③明… III. 社会 - 评论 - 中国 IV.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263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 |
| 书名原文 |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 著 者 | 〔英〕雷蒙·道森 |
| 译 者 | 常绍民 明 毅 |
| 丛 书 名 | 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主 编 | 黄兴涛 杨念群 |
| 责任编辑 | 马 燕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¼ 插页 2 字数 202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211-8/K·2318 |
| 定 价 | 22.00 元 |
-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不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 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

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1997 年至 1999 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 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

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1958年,我在中国呆了半年,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到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并使我渴望对那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然而我不久就逐渐感到,虽然我比许多就此议题撰写过著作的人更具有资格,但仅凭对那一国家如此短时间的接触就着手这样一项工程,实属鲁莽、胆大之举。因此,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对中华文明态度之历史这一更宽广的主题。

在我看来,这一主题应当对任何关心向西方阐释中国的人都具有意义,哪怕仅仅能帮助他廓清某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也好。但进行这种研究需涉猎的相关原始资料无边无际,因而在阅读时不得不作谨慎选择。我不得不斗胆进入许多与我所从事的汉学相距甚远的学术领域。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尝试利用新近的、可靠的权威著作,而不愿打扰难得空闲的朋友和同事们,因此我必须对书中不准确和误解之处负全部责任。

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对使用“欧洲”还是使用“西方”一词踌躇再三。最后我决定不用使人产生误解的“西方”这一术语,但选择“欧洲”一词并无意把北美、澳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与欧洲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地区排除在外。

撰写这样一部书,必然要引用许多作家的著作。在选择引

文时,我通常选中那些显然最具有影响的作家,但有时也引用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因为他们最有助于阐明我的观点。很不幸,为了表明我所讨论的对中国的误解的普遍存在,我不得不从现代学者的著作中找出它们来,而这些著作一般均是为我所赞赏不已的。我在本书中对他们以及许多人最近几十年来,朝着对中华文明真正有所了解的方向所取得的稳步进展着墨甚少,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在本书着力进行的分析,对中华文明的解释并无学术性的新观点,而只是增加了一部书的篇幅来叙述汉学史。我的宗旨一直是强调,要真正做到了解中华文明——实际上对任何文明都是如此——是何等的困难,并具体说明我们的理解何等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妨碍。因而,如果说我有时似乎对汉学巨擘们吹毛求疵,而不是充分意识到他们的伟大,那是我所从事的主题使然。

为了保持行文的连续,以免读者分心,我把注释放在了书末^①。考虑到有些读者希望进一步探究这一课题,我在注释中提出了一些供人们进一步阅读时参考的建议。这些建议面对的主要是一般读者,因为如今现成的可以为专家利用的书目材料很多。至于严肃的研究人员,我提供了书中所引用资料的出处,因为我深知缺少这些东西是何等的乏味和枯燥。

在附录中我还以更大的篇幅选录了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字,这样,读者不仅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华文明态度这一大合唱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欣赏到他们单个人的独唱。

① 译文中脚注系由译者所加。作者原注释在书末。

目 录

中国变色龙

前言	1
01 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1
02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	13
03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	45
04 中国与历史学家	83
05 东是东,西是西	113
06 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世界.....	133
07 未开化的中国人是怪异的.....	167
08 黄变红:20 世纪的考虑	197
附录:某些重要作家文字摘录	220
原书注释	276
年表	296

01 / 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1958年春季的一天，在广州至北京的快车上，一位乘客正起劲地谈论着新中国的奇迹。这是他在这一国度的第一天。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看到一个又一个篮球场，他用手不停地指着，激动不已。导游与其同行一样，很高兴地向他提供有关统计资料，以证明解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统计资料详细描述了全国各地篮球场的数量，引起了这位乘客的极大兴趣。在他心目中，篮球场是表明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准。

就在同一年，一位英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也访问了中国。当然，他笃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不同政见的权利以及英国人珍视的其他各种价值观念。他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回国后他著文告诉读者，称他向中国人问了各种各样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不同政见权及与类似观念相关的问题，但从未能得到令人满意和直截了当的回答。因而，中国“状况不好”。

上述两种看法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观感，在更大程度上不如说是陈述者的一己之见。他们的陈述与其说是描述性的，不如说是自传性的。这两位先生中，前者后来成为国际篮球协会的

一位官员,后者十分热衷于欧洲政治事务,以致未能向其中国主人提问出一些明智而有趣的问题。毋庸置疑,他也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解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的材料,但他可能对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感到怀疑和厌烦,而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往往看上去像英国人眼中的板球得分表那样迷人有趣。

这两位人物都是夸张的卡通式人物,但他们与实情是否相距甚远呢?不,相距不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与他们相像,因为我们对中国(或任何其他文明)的反应,部分受到当地客观情况的制约,部分受到自身兴趣、观念及潜意识需要的制约。对中国和中国人形成任何看法的任何人都是如此。结果,欧洲与中国关系史极为仰赖欧洲人对这一中央王国观念的本性,而这些观念的改变不仅与中国自身的变化有关,也与欧洲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这些发展既向欧洲人提供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比较基点,又造成了特定时期中国观念有助于满足其自身不断变更的需求和愿望。因而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此处难以全部罗列出来。本书的意图即在于分析这些有关中国的不断变化的观念,弄清到底哪些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哪些仅仅是出于欧洲的需要而杜撰、想象出来的。

在现今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显然至关重要。对我们的政治家、外交人员以及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直接交往的人来说是这样,对大街上的芸芸众生来说也是这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与中国的交往就将在可靠负责、消息灵通的舆论指导下进行。撰写出有关中华文明各个方面的足够权威的著作尚需诸多时日,让足够多的人对这一议题真正产生兴趣所需



1. 皇帝春耕仪式:18 世纪对中国父权家长制君主制的一个阐释。

G. S. 戈谢据 C. N. 科尚的一幅画所作的刻版画,出版于 1780 年。

承蒙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惠允转载,选自 A. H. 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一书。

的时间更为漫长。在进行这一工作的同时,描述一下较早时期欧洲对中华文明持有什么样的观念,为什么这些观念经常为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和变幻不定的,或许不无益处。它可以充当警世之作,旨在说明对一个拥有异己文化的遥远国度作出客观的判断,是何等的困难。

前文已经谈到,写出有关中华文明的足够权威的著作尚需很多时日。因而,在进入正文之前,我首先应当着重说明我们是如何开始对中国有了严肃的学术性了解的。在下文及全书各处,我将对英国方面的情况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不论我花多么大的力气同等地对待欧洲大陆人有关中华文明的观念,我的著作注定会与一位法国人或德国人出于类似的宗旨撰写的著作迥然不同。同时,既然我是为英国读者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我理应特别介绍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有关问题的态度、看法。不管怎样,偏见不会太过醒目,因为这一历史大都超越了民族界限,与我们整个欧洲的遗产相关。

由介绍英国对中国的学术性了解入手时,首先必须指出,在这方面并没有久已建成的等级公路形式的通衢大道,藉此英国人可以成为中国或远东其他国家问题的专家。达到这种专门知识的途径往往古里古怪,时常危险遍布,荆棘丛生。传教、领事工作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在过去一百年间强行打开了穿越汉语与世隔绝的丛林的通道,但在此之前孤零零的个人却负担起了首开人际罕至之小径的任务。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渴望招募日本专家到其宫廷服务。她颁布命令,在其所辖广袤的俄罗斯之东北沿海寻找失事的日本水手,一经发现,就应送往首都,勒



2. 当代中国之对比:(1)人们在紫禁城观光